

户籍获取、工资增长与农民工的经济同化

温兴祥*

摘要: 由于户籍的不同,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遭受歧视性的待遇,这严重阻碍了其与本地城市居民的经济同化过程。本文实证考察农民工获取本地城市户籍对其工资增长的影响,并将土地被征收从而取得城市户籍作为农转非户籍转换的工具变量。基于中国城乡流动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与持有农业户籍的农民工相比,本地城市户籍的获取显著增加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渠道分析表明,城市户籍的获取打破了职业进入壁垒,使得农民工能够进入较高收入的职业;城市户籍的获取减轻了户籍的工资歧视程度;城市户籍的获取降低了工作流动性,企业特定人力资本的提升也有利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与本地原始城市居民的对比分析表明,城市户籍的获取几乎消除了之前因户籍差异造成的对工资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经济同化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核心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这需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蔡昉,2013)。户籍作为割裂城乡的制度安排,其所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不平等广受诟病(陈斌开、林毅夫,2013)。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在于打破户籍身份依赖的公共服务分配体制,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得进入城市地区的农村居民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和城市居民同等地分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处(蔡昉,2010)。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表现为迁移到城市地区的农村移民完全融入到城市中去,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同化,而经济上的同化则是实现其他方面融合的基础。虽然“农”与“非农”的区别正逐渐被打破,但户籍仍然对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具有显著影响。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本地城市户籍的获取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村移民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同化?

以往的研究表明,户籍对流动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居民有深刻的负面影响,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邢春冰,2008;邢春冰、罗楚亮,2009;陈珣、徐舒,2014)。工资收入的差距首先是由于两者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差异造成的。由于城乡巨大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在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之前所能获取的教育资源极为有限。因此,当他们流动到城市地区寻找工作机会时,较低的教育人力资本积累难以和城

*温兴祥,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10046,电子信箱:wenxxeco@gmail.com。

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杜在超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詹鹏、曾璐璐在修改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镇居民相竞争,农民工所能从事的都是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Meng and Zhang, 2001)。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差异导致的“有形”职业分割产生了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其次,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面临歧视性的待遇。城市居民由于长期享受着带有政府补贴的各种公共服务,具有心理上的优越感;地方政府考虑到职位晋升,也不希望农村移民给当地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对农民工设置歧视性政策的情况已是司空见惯。即使在具有同等资质和能力的情况下,拥有农业户籍的农村移民也无法获得诸如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的工作,因为这些职位只向拥有本地城市户籍的居民开放;另外,由于职业内的户籍歧视,存在大量“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陈钊等, 2009; 余向华、陈雪娟, 2012; 吴晓刚、张卓妮, 2014)。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户籍制度也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当前的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已经基本不存在,各地户籍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落户条件和公共服务的区别。中央政府将户籍管理的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依据辖区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落户条件。在劳动力存在短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激励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稳定当地的劳动力供给(Bao et al., 2011)。虽然大城市的落户条件仍很严格,但中小城镇的落户条件已较为宽松^①。数据显示,1991—2002年间,平均每年新增非农户口人数947万,年均增长率为3.4%;而在2002—2007年间,平均每年新增非农户口人数1646万,年均增长率为4.3%,非农户口人数的增加很大一部分源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在迁移地获取了城市户口(蔡昉, 2010)。当农民工获取到当地城市户口后,这种户籍身份的转换是否削弱其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因之前户籍的差异造成的对工资的负面影响?如果存在户籍获取的工资增长效应,这种效应又是如何实现的?本文旨在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获取到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和普通农民工相比,可能具有系统性的特征差异,如前者工作更努力、适应性更强等,这使得他们不但能够成功获取到当地城市户口,而且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较高的工资回报。这些系统性差异特征往往无法在研究中予以充分控制,从而引起估计过程中因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偏误问题。本文通过以下两点尽量减轻户籍的内生性问题:第一,寻找可比对象。从户籍的角度,可以把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群体区分为三类:拥有农业户籍的农民工、经历过农转非户籍转换并在调查时点拥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和本地原始城市居民。本文以农民工为关注对象,考察户籍类型对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影响。经历过户籍转换并在调查时点拥有非农户籍的城市居民在户籍上具有和农民工较为相似的诸如生活、教育等方面的体验,相对而言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首先将研究样本设定为农民工和经历过户籍转换并在调查时点拥有非农户籍的城市居民;第二,寻找工具变量。我国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两者往往是联动的(陆铭, 2013)。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伴随着大量土地被征收,同时,一些原来是农业户口的居民被当地政府赋予城市户籍。“被迫城镇化”常常被用来形容这一部分人群,

^①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被迫”二字也表明了通过土地被征收从而实现户籍类型转换的外生特征。本文把由于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取本地城市户籍作为户籍类型的工具变量,尽量消除不可观测特征差异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取城市户籍不会影响户籍获得者的劳动力禀赋特征,但却会直接影响户籍状态的变更,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户籍转换工具变量。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城乡流动调查(Rural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RUMiC),基于工作地的抽样设计使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中国城乡流动调查的城镇居民调查部分提供了获取当地城市户籍的原因,这是本文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信息来源。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Two stage least square, 2SLS)的估计结果表明,相对于持有农业户籍的农民工,获取到本地城市户籍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群体 20.3% 的小时工资收入。这种户籍获取的工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的? 本文首先从户籍工资歧视、职业进入壁垒进行考察,这两个方面常被以往研究用来解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异,而本文试图从动态的视角理解城市户籍的获取是否减轻了户籍工资歧视和职业进入壁垒。然后,本文从工作稳定性角度对户籍获取的工资增长效应做进一步的检验: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使得他们难以积累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Firm specific human capital),而当地城市户籍的获取是否有利于工作稳定性的提升从而提高工资水平? 从这个方面解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同样采取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取当地城市户籍作为工具变量的识别策略分析结果发现,本地城市户籍的获取显著降低了因为户籍差异引起的工资歧视、增加了从事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工作稳定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最后,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农转非”城市居民和原始本地城市居民,考察城市户籍的获取是否能够真正地消除工资水平因之前户籍状态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在这两类人群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城市户籍的获取几乎消除了户籍转换之前因户籍类型不同而存在的工资差异。

本文在实证分析上的创新有:第一,利用极具中国特色的户籍转换自然实验估计户籍类型对城镇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因果影响,这是本文在相关文献中的特色;第二,在自然实验估计的大框架下,本文详细探讨了户籍类型影响工资水平的渠道。以往的研究往往从静态的视角利用各种分解技术考察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类型户籍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而本文户籍转换的研究视角则具有动态的特点:由于户籍的转换,因户籍类型的不同所造成的职业进入壁垒、户籍工资歧视是否降低,而工作流动性是否得以提高? 第三,本文通过形成两组与农民工对比的群体,尽量增进主要结论的可信度并探析户籍影响的程度。为了降低众多潜在影响因素造成的遗漏变量内生性问题,研究者往往希望通过找到和主要研究对象最具可比性的群体,进而估计某一主要变量对结果变量在不同群体间的一致因果影响。本文以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同时利用经历过户籍转换并在调查时点拥有非农户籍的城市居民和本地原始城市居民。把农民工和前者作为分析对象可以减轻不可观测异质特征对一致估计造成的影响,而把农民工和后者作为分析对象有助于发现户籍影响工资的程度。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述本文的实证策略;第三部分说明数据和变量;第四部分为主要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检验户籍获取工资增长效应的实现机制;第六部分为稳健性检验;最后,第七部分总结全文。

二、实证策略

鉴于户籍对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表现的影响,以及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本文关切的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同化进程。都阳等(2014)从宏观视角考察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促进劳动力流动,这将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和提高城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微观个体视角,考察农民工获取本地城市户籍对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实现的渠道。首先,就实证研究而言,需要确定与获取本地城市户籍的“农转非”群体相比较的分析群体。农民工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和“农转非”城市居民群体具有相同的农业户口经历,而这些经历往往和教育等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相关。在稳健性分析部分,本文还将利用从未转换过户口类型的原始城市居民和“农转非”城市居民样本,考察户籍获取对后者工资增长的影响。虽然从未转换户籍类型的城市居民的可比性小于实现户籍转换的城市居民,但在利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所得估计值还是较为一致的。在确定了研究样本的选择之后,接下来详细说明本文具体的实证步骤及策略。

为了考察户籍获取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本文首先估计标准的明瑟收入方程(Heckman et al., 2006),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变换不同的控制变量实现两个目的:第一,通过加入户籍变量,观察其对收入方程估计结果的影响;第二,通过加入渠道变量,考察户籍获取影响工资的可能渠道。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估计户籍获取的影响将存在遗漏不可观测因素引起的内生性偏误:成功获取当地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可能具有不同于普通农民工的系统性不可观测特征差异。一般来说,只有工作更加努力、适应性更强、能力更高的农村移民才能够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同时,这种特征也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更高。遗漏诸如此类的不可观测特征将会导致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偏误。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特有的制度安排,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土地城市化过程,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很大一部分土地是通过征收农民的土地而得以实现的,同时,地方政府把给予城市户籍作为征地拆迁的补偿。一方面,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取城市户籍是个体在短期内无法预期的,不会改变他们的劳动力禀赋;另一方面,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取城市户籍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因此,由于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取城市户籍是“农转非”户籍转换的一个较为合理的工具变量。^①本文的主要结论可能只适用于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和城市近郊经历过户籍转换并在调查时点拥有非农户籍的城市居民总体。

运用工具变量法估计得到户籍获取影响农民工工资的一致估计值后,本文继续考察这种影响的作用渠道。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检验户籍对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户籍工资歧视、职业进入壁垒和工作流动性。第一,户籍的获取是否能够消除户籍依赖的工资歧视,从而提高农村移民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上歧视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人力

^①因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得城市户籍往往会带来一笔补偿金,这可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决策。后文专门讨论了由此引起的工资方程估计的样本选择问题。

资本回报率的差异,本文先估计本地城市居民的明瑟收入方程,可观测特征系数估计值即不存在户籍歧视下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然后用这些系数分别拟合农民工和“农转非”样本,得到工资收入拟合值,将工资拟合值和实际工资相减即为户籍工资歧视的程度;最后,实证考察城市户籍获取对户籍歧视工资的影响;第二,本地城市户籍的获取是否会打破职业进入壁垒,让农村移民获取到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作岗位?本文将职业类型划分为高收入职业和相对较低收入职业,通过考察户籍获取影响农民工从事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以检验户籍获取影响职业进入壁垒从而作用于工资水平的渠道;第三,户籍获取是否能够提高农村移民的工作稳定性,从而有利于积累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进而实现工资的增长?张春泥(2011)的分析表明,户籍歧视是造成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原因。频繁变换工作会降低企业特定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影响工资水平(Hashimoto, 1981)。调查时点所从事工作的年限能够很好地反映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工作年限越长表示工作流动性越低、稳定性越高。本文考察城市户籍的获取是否影响调查时点所从事工作的年限来检验户籍对工作稳定性的影响。以上渠道分析同样在工具变量的框架下进行估计。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08年中国城乡流动调查,该调查工作由来自澳洲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发起并组织实施,旨在通过动态跟踪调查研究中国人口迁移状况以及人口迁移产生的影响。根据调查对象的户口属性,RUMiC分别设计了城镇住户调查(UHS)、流动人口调查(MHS)和农村住户调查(RHS)来分别收集城市居民、农民工、农村居民的信息。UHS覆盖了9个省、18个城市;MHS覆盖了9个省、15个城市。RUMiC第一轮调查于2008年开始实施,之后城镇住户调查和农村住户调查各进行了四轮、流动人口调查进行了五轮。城镇住户调查和农村住户调查都是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流动人口调查由专业的调查公司负责。由于农民工流动和短暂迁移的特征,不存在针对流动人口调查的现成抽样框。RUMiC专家组设计了针对流动人口特征的抽样框,能够更好地获取对农具有代表性的样本^①。目前只有前两轮数据公开可得。RUMiC的大规模、深入的问卷设计、追踪调查性质使得它成为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可多得的数据库(Akgüç et al., 2014)。

本文选取城镇住户调查和流动人口调查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研究主题,在流动人口调查部分,删除少量城市户口居民样本,仅保留农业户口样本,包括本地农业户口居民和外来农业户口居民,他们即是所谓的“农民工”群体;在城镇住户调查部分,仅保留从农业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对于城镇住户调查的这一部分城市居民,RUMiC还询问了获取城市户口的原因,相对于其他获取城市户籍的方式,土地被征收对个体而言是更为外生的^②。本文利用

^①大量的农民工住在工厂附近的宿舍和建筑工地,没有登记注册的住所。RUMiC团队通过以下方式抽取调查样本: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街区,随机选择街区进行人口情况的预调查,获取农民工和工作场地的名单,用来估计每一个城市总的农民工数量。根据这些名单数据,设计基于工作场地的抽样框,进而抽取农民工调查样本。

^②其他原因包括教育、参军、干部、购买城市住房和其他。

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取城市户籍作为农转非户籍类型转换的工具变量。对于城镇住户调查和流动人口调查,本文仅保留工作性质是受雇的样本。保留16-60岁的男性、16-55岁的女性的劳动力样本,并删除存在变量缺失的样本。最后,用于主回归的4941个样本中,流动人口4354个、经历过农转非的城镇居民587个。

(二)变量

以下说明主要变量及其构造:(1)户籍。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户口除了按类型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还可以将户口按照户口所在地划分为“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这也是理解和研究户籍影响的关键。样本选择后的流动人口调查样本的户口状态都是农业户口,城镇住户调查样本都是城市户口,且后者都经历过农转非的户籍转换。本文户籍变量是一个二值变量,如果受访者的户口是农业户口,则取值为1;农转非,则取值为0。(2)工资。考察劳动者工资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小时工资,因为小时工资最能反映劳动者的生产率。本文基于RUMiC提供的关于第一职业的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构造小时工资变量。RUMiC询问了调查时点主要工作的月收入和主要工作的周工作时间。将周工作时间(小时)乘以4.3计为月工作时间,然后将月收入除以月工作时间得到小时工资。^①在工资方程的估计中,对小时工资取对数。(3)职业。RUMiC询问受访者的职业状况,按照国家的职业分类标准分为八类,删除第五类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第七类军人和第八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对剩余的五类分别构建二值虚拟变量,所以本文有五种职业类型虚拟变量。

除了上述变量,本文还分别构建了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婚姻状况、自评健康、反映精神健康状况的GHQ12得分、调查时点所从事工作的工作年限。^②

数据描述性分析表明,农民工和农转非群体在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积累、工作年限和职业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是否因为这些可观测特征的差异造成的?在控制这些可观测特征的情况下,如果两者仍然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的根源在哪里?下文通过前文所述实证策略,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以回答这些问题。

四、户籍获取对工资的影响

(一)基准结果

本文首先通过OLS估计展示户籍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以及户籍获取影响工资的潜在机制,表1为城市户籍对工资影响的估计结果。第(1)列是标准的明瑟收入方程。可观测特征对工资的影响符合以往研究的结论^③。男性的小时工资比女性显著高出11.1%;年龄与工资存在倒U型关系,即工资先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然后到达一定的年龄后下降,计算得到这一年龄为38.9岁;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也有助于工资水平的提升,估计结果显示教育回报率为6.4%,即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小时工资增加6.4%;健康状况的提升也有助于提高工资水平,自评健康是对个体整体健康状况的衡量,相对于自评健康最差的那一组,自评健

^①一年平均365.25天除以7,那么一年平均是52.18周,再除以12,得每月平均4.3周。

^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其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③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未在正文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康中、良、优都正向作用于工资水平;以 GHQ12 衡量的精神状况对工资也存在显著的影响, GHQ12 得分越高者工资越低。^① 第(1)列基准明瑟收入方程所包含的可观测特征解释了个体工资差异的 32.5%。

表 1 户籍获取对工资影响的 OLS 估计

变量	(1) 明瑟方程	(2) +城市户口	(3) +工作年限	(4) +职业	(5) 全设定
城市户籍获取		0.486 *** (0.027)	0.371 *** (0.029)	0.390 *** (0.031)	0.298 *** (0.032)
工作年限			0.017 *** (0.001)		0.015 *** (0.001)
单位负责人				0.471 *** (0.048)	0.455 *** (0.048)
专业技术人员				0.306 *** (0.043)	0.261 *** (0.043)
办事人员				0.168 *** (0.025)	0.170 *** (0.024)
生产、运输人员				0.155 *** (0.013)	0.136 *** (0.0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076 (0.104)	0.423 *** (0.098)	0.433 *** (0.097)	0.498 *** (0.096)	0.500 *** (0.096)
R ²	0.325	0.392	0.415	0.430	0.446
样本数	4 941	4 941	4 941	4 941	4 941

注:本表所示为户籍类型对工资影响的 OLS 估计结果;城市户籍获取为二值分类变量,反映城乡户籍类型;职业虚拟变量的基准组为商业、服务业人员;未列示控制变量为性别、婚姻状态、年龄及其平方、教育年限、自评健康、精神健康、城市固定效应;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第(2)列在第(1)列明瑟方程的基础上加入户口状况变量。可以看到,城市户口变量与工资呈现显著正向关系,获取城市户籍的居民比农民工的工资高出 48.6%。同时,拟合优度从第(1)列的 0.325 增加到了 0.392,提高了 20.62%。这说明城市户籍对工资差异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接下来,我们通过分别加入工作年限和职业变量,观察城市户籍的获取对工资影响的变化。第(3)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工作年限变量,城市户口系数减小到 0.371,仍然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工作年限对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提高 1.7%。第(4)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职业变量,并将商业、服务业人员遗漏为基准组。从事其余几类职业的劳动者工资均显著高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劳动者。例如,作为单位负责人的劳动者小时工资比商业、服务业人员高出 47.1%!其余几类职业的工资水平也显著高于商业、服务业。城市户口同样在 1%的统计水平下与工资显著相关,系数变为 0.39。最后,我们将工作年限、职业同时加入工资方程的估计中,第(5)列为估计结果。最为关心的城市户口仍然与工资显著相关,但系数减小到 29.8%。

通过表 1 的 OLS 估计,本文发现城市户籍的获取显著提高流动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居民的工资水平,且这种影响与工作年限、职业选择存在关系。接下来,本文通过利用

^①GHQ12 得分越高,表示精神状况越不好。RUMiC 设计了一组由 12 道反映精神状态不同方面的问题组成的量表,基于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构造反映整体精神状况的 GHQ12 得分变量。

城镇化进程中因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得城市户籍作为户籍状态变量的工具变量,提供更多的在因果关系方面的证据。

(二) 工具变量估计

获取当地城市户口的农村居民可能具有不同于普通农民工的一些不可观测差异特征,这些差异不但决定是否获取当地城市户籍,而且同时影响工资水平,所以前文的 OLS 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土地被征收从而被赋予城市户籍是一个外生事件,不与决定个体工资水平的特征相关,因此本文将经历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得城市户籍作为户籍转换的工具变量,运用 2SLS 重新估计户籍获取对工资的影响,表 2 为估计结果。第(1)列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被征收与城市户口的获取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在土地被征收的情况下,获得城市户口的概率显著增加 61.7%。另外, F 检验统计量值远远大于弱工具变量所提示的临界值,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Staiger and Stock, 1997)。

第(2)列为工具变量估计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与表 1 结论类似,城市户口的获取显著提高工资水平:拥有当地户籍能够提高农民工小时工资收入的 20.3%。比较表 1 第(5)列 OLS 估计值和表 2 第(2)列 2SLS 估计值,后者估计值的数值略小于前者,未考虑内生性问题将高估户籍对工资的影响。

表 2 户籍获取对工资影响的 IV 估计

变量	(1)	(2)
	城市户籍获取	工资
土地被征收	0.617 *** (0.026)	
城市户籍获取		0.203 ** (0.097)
控制变量	YES	YES
常数项	-0.430 *** (0.058)	0.460 *** (0.105)
R^2	0.587	0.445
F statistic	132.2	
样本数	4 941	4 941

注:本表所示为城市户籍获取对工资影响的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使用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得城市户口作为户籍转换的工具变量。第(1)列为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第(2)列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未列示控制变量同表 1;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三) 样本选择问题

由于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得城市户口,可能伴随着个体劳动供给行为的改变。例如,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往往会得到一笔不菲的土地补偿金,这对被征用土地家庭的收入和财富水平有一定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劳动供给行为(比如劳动参与、职业选择等),继而影响工资水平。由于本文在工资方程的估计中控制了职业类型,所以因土地被征收而获得补偿金引起的职业选择改变不会对本文的估计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因土地被征收而转换户籍类型导致一部分人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本文对工资方程的估计将存在样本选择问题:调查数据中没有这部分样本个体工资的信息,从而在估计工资方程时这部分样本没有进入估计过程,产生样本选择偏误。

处理工资方程样本选择偏误的标准计量方法为赫克曼选择模型 (Heckman, 1979)。为

了获得更为稳健的识别,需要寻找一个只影响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选择方程),但不影响工资水平的工具变量(工资方程)。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户籍转换对城镇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影响,实证策略为土地被征收从而实现户籍的外生转换。在这个实证策略下,再去寻找一个满足克服工资方程样本选择偏误的工具变量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这是采用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得城市户口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工资方程时的局限性。

五、户籍获取影响工资的机制分析

前文利用土地换户籍的自然实验,估计了城市户籍获取对农民工工资的因果影响,发现户籍身份的转换显著起到提升工资水平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想知道这种户籍获取的工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城市户籍获取对农民工工资影响的实现机制,有助于理解户籍差异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具体原因,也有助于为当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经验证据上的支持。我们发现,城市户籍的获取显著降低农民工的户籍工资歧视程度、增加他们从事高收入职业的概率,同时,城市户籍的获取提高了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户籍获取的工资增长效应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户籍工资歧视	高收入职业	工作年限
城市户籍获取	-0.203 ** (0.097)	0.433 *** (0.062)	2.463 ** (1.103)
工作年限	-0.002 (0.002)	0.002 (0.002)	
单位负责人	-0.063 (0.051)		1.838 *** (0.582)
专业技术人员	-0.042 (0.059)		5.277 *** (0.856)
办事人员	-0.074 ** (0.033)		0.902 ** (0.401)
生产、运输人员	-0.151 *** (0.012)		1.259 *** (0.15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1.158 *** (0.105)	-0.258 *** (0.083)	-2.013 (1.423)
R^2	0.254	0.329	0.353
F statistic	552.4	1043	717.1
样本数	4 941	4 941	4 941

注:本表所示为户籍获取工资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未列示控制变量同表1;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一) 户籍工资歧视

首先,获取当地城市户籍能否减轻户籍工资歧视,从而提高工资水平?工资歧视定义为可观测特征回报率的差异和不能够被可观测特征解释的工资差异部分。衡量工资的户籍歧视程度可以利用可观测特征回报;城市居民的可观测特征回报当然不存在歧视成分,用城市居民的可观测特征回报去拟合农民工和农转非群体的可观测特征,拟合值为无户籍工资歧视情况下的工资水平。无歧视工资与现实工资的差值代表了工资因为户籍歧视而受到损失的部分,将农民工和农转非群体的工资因为户籍歧视而减少的部分描绘在图1中。农民工工资因为户籍歧视显著降低,农转非样本的户籍歧视工资均值为零,即平均而言,农转非个

体不因以往的农业户口经历而在工资上遭遇不公平的对待。表 3 第(1)列为户籍获取对户籍工资歧视的 2SLS 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不存在户籍工资歧视情况下的工资水平与现实工资水平的差值。估计结果显示,城市户口显著降低户籍工资歧视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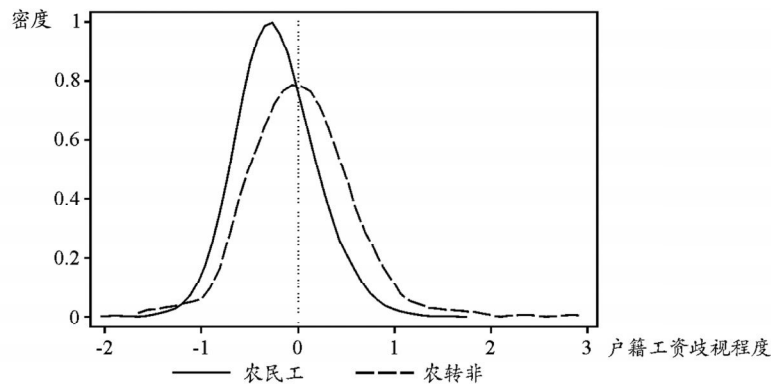


图 1 户籍工资歧视

(二) 户籍职业进入壁垒

通过对 RUMiC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我们发现农民工与农转非群体在职业分布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而宋锦和李实(2013)的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减轻了农民工的职业歧视。农民工与农转非群体在工资上的差异是否因为职业进入的原因造成的?表 4 列出了不同职业的工资水平,不同职业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小时工资都是 13.97 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平均工资为 9.60 元,其次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 7.11 元,平均小时工资最低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的 5.57 元。将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定义为高收入职业,与之相对应的较低收入职业为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宋锦和李实(2013)的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减轻了农民工的职业歧视。接下来,本文从职业选择的角度对户籍获取影响工资增长的效应进行检验。表 3 第(2)列估计结果表明,拥有城市户口显著增加进入高收入职业的概率。

表 4 各职业工资水平

职业	样本数	小时工资	
		均值	中位数
单位负责人	125	13.97	9.69
专业技术人员	200	13.97	11.6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35	9.60	7.75
商业、服务业人员	2 691	5.57	4.74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1 490	7.11	6.30

注:数据来自 2008 年 RUMiC 的流动人口调查和城镇住户调查中的农转非样本;各职业工资的均值和中位数单位都是元/小时。

(三) 工作流动性

造成农民工群体工资水平较低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作流动性高。很多研究表明,农民工就业时间短、流动性大,不利于其积累企业特定人力资本,从而实现工资水平的提升。此外,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大,企业也不愿意给他们做培训。户籍的获取是否能够提高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从而实现企业特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相应工资水平的提升?本文以调查

时点所从事工作的年限代表工作流动性,工作年限越长表示工作流动性越低。表3第(3)列为户籍获取对工作年限影响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城市户籍的获取显著提高了工作年限,取得当地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的工作年限比普通农民工多出2.46年。特定企业工作年限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流动性的降低,企业特定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助于工资水平的提升。

六、稳健性检验:与本地原始城市居民的比较

上文的分析思路基于选取与“农转非”城市居民最相似的人群进行对比考察分析,以此希望减轻遗漏不可观测特征内生性问题。无论是OLS估计还是2SLS估计,我们都发现城市户籍的获取显著提高了以农民工和“农转非”城市居民为研究总体的工资水平。城市户籍的获取是否真的能够使得农村移民不再因为户籍的差异而遭受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待遇,即在相同可观测特征的情况下达到与本地原始城市居民相同的劳动力市场结果?接下来,本文将“农转非”城市居民和本地原始城市居民作为分析对象,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检验户籍获取的工资增长效应。

按照和表1相同的模型设定策略,表5报告了城市户籍获取在新样本中对工资水平影响的估计结果。户籍获取变量估计系数在OLS回归下虽然为负,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与第(1)列比较,第(2)列加入户籍获取变量后,拟合优度没有任何提高,都为0.278。第(3)列、第(4)列和第(5)列分别加入工作年限、职业以及同时加入这两项,户籍转换对工资均无显著影响。同样利用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取城市户籍作为户籍获取的工具变量,第(6)列2SLS估计结果仍然显示,户籍获取对工资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表5的结果惊人地展示了户籍获取对于农民工群体工资增长影响的效果,城市户籍的获取几乎使得以往的户籍经历不再对工资起到任何显著的影响。

表5 户籍获取对工资的影响(与本地原始城市居民的比较)

变量	(1)	(2)	(3)	(4)	(5)	(6)
	明瑟方程	+户籍获取	+工作年限	+职业	全设定	工具变量
城市户籍获取		-0.015 (0.028)	-0.024 (0.027)	-0.003 (0.027)	-0.013 (0.026)	0.071 (0.073)
工作年限			0.015*** (0.001)		0.014*** (0.001)	0.014*** (0.001)
单位负责人				0.502*** (0.047)	0.431*** (0.048)	0.432*** (0.048)
专业技术人员				0.345*** (0.032)	0.261*** (0.032)	0.265*** (0.032)
办事人员				0.158*** (0.030)	0.121*** (0.029)	0.122*** (0.029)
生产、运输人员				0.091*** (0.031)	-0.006 (0.032)	-0.006 (0.03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367*** (0.242)	1.395*** (0.246)	1.608*** (0.240)	1.390*** (0.240)	1.623*** (0.236)	1.466*** (0.267)
R ²	0.278	0.278	0.323	0.325	0.359	0.357
样本数	2 913	2 913	2 913	2 913	2 913	2 913

注:数据来自2008年RUMiC的城镇住户调查;第(1)列至第(5)列为OLS估计结果,第(6)列为IV估计结果,使用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得城市户口作为城市户籍获取的工具变量;职业虚拟变量基准组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未列示控制变量同表1;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七、结论

户籍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在于破除因户籍身份的不同而造成的诸多差异。本文基于2008年中国城乡流动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本地城市户籍的获取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影响。为了处理不可观测特征引起的遗漏变量偏误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农民工和“农转非”城市居民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然后采用土地被征收从而获得城市户籍作为户籍状态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本地城市户籍的获取显著提高农民工20.3%的小时工资收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本地城市户籍的获取确实起到了减轻户籍的工资歧视、打破因户籍差异造成的职业进入壁垒、降低工作流动性的作用。户籍工资歧视程度的降低直接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职业进入壁垒的打破使得农民工能够从事收入相对较高的职业,工作稳定性的提高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些都有利于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户籍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中破除城乡差异、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未来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虽然我国名义上的城乡二元户籍区别在2014年被全面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地区之间依附于户籍的公共服务差异仍然非常显著,农村移民在城市落户仍然受到许多限制。在关注实现不同户籍背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口自由迁移的同时,如何使得农村移民完全融入城市是另一个关键的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本地城市户籍获取有利于其工资增长,这有利于农村移民与城市居民的经济同化。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过去依赖无限劳动供给创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难以为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而构建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通过改革实现“改革红利”将是未来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潜在方向。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2008年的调查,虽然所得结论的一般性意义对于当下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中国社会极速变化,社会经济环境可能今非昔比,未来在有同样条件的较新数据的情况下,值得采用相同的实证策略再次估计户籍获取的工资增长效应。

参考文献:

1. 蔡昉,2010:《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统筹》,《经济学动态》第12期。
2. 蔡昉,2013:《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经济研究》第3期。
3. 陈斌开、林毅夫,2013:《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4. 陈珣、徐舒,2014:《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及动态同化》,《经济研究》第10期。
5. 陈钊、陆铭、佐藤宏,2009:《谁进入了高收入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第10期。
6. 都阳、蔡昉、屈小博、程杰,2014:《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经济研究》第8期。
7. 陆铭,2013:《空间的力量》,格致出版社。
8. 宋锦、李实,2013:《中国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与劳动力职业分布》,《世界经济》第7期。
9. 吴晓刚、张卓妮,2014:《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10. 邢春冰,2008:《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管理世界》第5期。

11. 邢春冰、罗楚亮, 2009:《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基于半参数方法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12. 余向华、陈雪娟, 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效应及其变迁》,《经济研究》第12期。
13. 张春泥, 2011:《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 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社会》第6期。
14. Akgüç, M., C. Giulletti, and K. F. Zimmermann. 2014. "The RUMiC Longitudinal Survey: Fostering Research on Labor Markets in China." *IZA Journal of Labor and Development* 3(1):1-14.
15. Bao, S., Ö. B. Bodvarsson, J. W. Hou, and Y. Zhao. 2011. "The Regulation of Migr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China's Hukou System."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9(4):564-579.
16. Hashimoto, M. 1981. "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as a Shared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3):475-482.
17. Heckman, J., L. Lochner, and P. Todd. 2006. "Earnings Functions, Rates of Return and Treatment Effects: The Mincer Equation and Beyond." I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Edited by Eric A. Hanushek, Stephen Machin and Ludger Woessmann, Chapter 7: 307-458.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8. Heckman, J. J. 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47(1):153-161.
19. Meng, X., and J. Zhang. 2001.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3):485-504.
20. Staiger, D., and J. H. Stock. 1997.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with Weak Instruments." *Econometrica* 65(3):557-586.

Urban Hukou Acquisition, Wage Increase and Economic Assimil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Wen Xingxi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needs to push further in order to boost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urrent China. Rural migrant workers are discriminated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which impedes their economic assimila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This paper tests whether and how urban *hukou* acquisition increases rural migrant workers' wage. Using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land expropriation and the data from Rural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survey, we find that acquirers urban *hukou* significantly increase rural migrant's wage rate than migrants who remain hold rural *hukou*. Channe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urban *hukou* decreases *hukou*-based wage discrimination, increases chances to enter into high-wage industry and improves work stability which may boost 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Lastly, comparison analysis using indigenous urban resident indicate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urban *hukou* almost perfectly eliminates *hukou*-based labor market wage disadvantages of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New Urbaniz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Rural Migrant Worker, Economic Assimil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31, J71, J48

(责任编辑:陈永清)